

言行·思想·立场

陳益壽著



.I3

3.1

重慶人民出版社

言行·思想·立场

——

——



——

言行·思想·立场

陈益寿著

重庆人民出版社

內容提要 本書通過對資產階級右派分子所散布的種種反動謬論的分析批判，論述了這樣幾個問題：（一）衡量一個人的言論行動的正確與否的標準是什麼？（二）一個人的言論行動和他的思想、立場之間有着一種什麼樣的關係？為什麼說言行、思想、立場這三者是統一的？（三）什麼是立場？怎樣判斷一個人的立場？立場和動機和獨立思考的關係怎樣？如何才能破資本主義立場，立社會主義立場？

言行·思想·立場

陳益壽著

*

重慶人民出版社出版

（重慶嘉陵路344號）

重慶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1號

重慶市印刷公司印刷

新華書店重慶發行所發行

*

開本787×1092 1/32 印張2 字數39千

1958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1—70,000

統一書號：7114·54

定價：（5）0.15元

目 次

- 一 言行的正确和謬誤的标准……………(1)
 - 一 我國現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
 - 二 什么是正确的言行? 什么是錯誤的言行?
- 二 言行、思想、立場的統一性……………(17)
 - 一 有怎樣的立場, 就有怎樣的思想观点
 - 二 人們的思想, 观点是通过言行表現出來的, 言行表現思想
 - 三 沒有无思想の言行, 也沒有完全不表現于言行的思想
 - 四 資產階級右派言行的多样性与反动思想立場的同一性
- 三 根本問題是立場問題……………(42)
 - 一 什么是立場? 怎样判断一个人的立場?
 - 二 立場与动机
 - 三 立場与独立思考
 - 四 破資本主义立場, 立社会主义立場

一 言行的正確或謬誤的標準

一 我国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

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胜利地超额完成了。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们已经确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社会大变动的时期。

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发生了巨大的深刻的变化。我们提前和超额完成了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我国的国民经济已经基本上由多种成分转变为单一的社会主义成分，这样也就基本上结束了我国几千年来阶级剥削的历史，确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

我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的成就也是非常巨大的。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来看，一九五七年现代工业、手工业和农业的生产总值，比一九五二年增加60%以上，其中现代工业产值增长达130%，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已经有很大

的增长。

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心的工业基本建设，按照投资额计算，**五年计划期间的**5%以上。以苏联帮助我国设计的一百五十六项为限额以上的工业建设单位，五年内开始施工

的共有八百二十五个。这是我国現代大工业的第一批骨干，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事业有巨大的作用，它們虽然还没有全部达成，但是已經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立了初步基础。

农业、交通运输业、商业和文化教育事业等方面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超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計劃所規定的任务。

我們过去做的和現在正在做的是前人所沒有做过的事，我們在過去五年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是很难用語言和数字表述无余的。当人們以豪迈的心情回顧已經走过的这光輝燦爛的五年的时候，也就情不自禁地产生了对于祖国未来的殷切展望。人們都在回憶着过去的五年我做了些什么，做得怎样，今后，或者今后的五年，又將要做些什么，怎样去做；过去五年祖国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今后，或者今后的五年，又將发生怎样的变化。回顧过去的成就，展望祖国的未来，这本身就会产生一种力量，激励人們为社会主义建設取得更大的成就和祖国的更加美好而不懈奋斗。

随着我国經濟面貌的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人們的思想意識也就必然要引起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特别是作为社会存在的决定因素——物質資料的生产方式的变更，我国由多种經濟成分轉变为單一的社会主义經濟成分，我国在經濟战綫上資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誰战胜誰的斗争，也就必然要反映到人們的思想領域中去。为了巩固我們在經濟战綫上已經取得的偉大成就，为了巩固我們已經建立但是还不十分巩固的社会主义經濟制度，为了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建設的迅速发展，我

們就必須在政治上、思想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一書中指出，“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过去遺傳下来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所以，毫不奇怪的，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过去遺傳下来的种种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①

一方面，人們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偉大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兴奋地看到了新时代的光明的前景，热情地考虑着自己將如何更好地貢獻自己的力量为祖国的明天而奋斗；另一方面，我国社会生活的大变动，所有制关系的改变，当前的阶级斗争，又必然在人們的头脑中有所反映，人們不可避免地会感到这样那样的不习惯，不协调，生疏，不摸底，“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規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羣众阶级斗争基本結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結束；广大羣众一面欢迎新制度，一面又还感到还不大习惯……”②在这种情况下，人們都面临着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新制度这样一个問題。人們渴望自己的言行能够促进新制度的巩固和社会主义建設的发展，克服与此不相符合的思想言行和生活习惯。

特别是知識青年，通过大鳴大放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之后，許多人都感到分清敌我、明辨是非的确还是一个問題。他們中間有不少的人，在大鳴大放和反对资产阶级右派的斗争中，曾經一度分不清敌我，往往認敌为友，把右派分子向党向人民向社会主义所发动的猖狂进攻，認為是如右派分子所說的那樣在“帮助党整风”，“反对三大主义”；有的人則認為右派分子是由于“情緒偏激”，才犯了一些錯

誤，而心腸还是好的；有的人則認為某些右派分子这次是偶然失足，言語有失，他們的言行虽然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是他們的思想并不一定就反党反社会主义。因為他們分不清敌我，所以也就分不清是非。他們一度以非为是，以是为非。他們在个別的問題上一度贊同右派分子的思想言論，或者对于右派分子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行，既不表贊同，但也并不反对。他們在反对資產階級右派的斗争中，顧慮重重，犹豫不定，担心这样，担心那样，感到自己軟弱无力。他們好象在反对資產階級右派的这场階級斗争中处于中立，实际上是思想上不能分清敌我，明辨是非。經過反对資產階級右派的斗争，特别是經過整风和社会主义思想教育运动以后，他們才恍然大悟，开始認識到自己以前对右派分子及其言行的某些看法是錯誤的。因此，对于知識青年來說，分清敌我，明辨是非，就显得格外重要。他們中間絕大多數是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他們也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設和社会主义改造所取得的偉大胜利而感到欢欣鼓舞，热情地期望着自己將如何更好地为建設社会主义而献出自己的力量。在这种心情下，他們回顧过去的斗争，總結自己的經驗，考虑着什么是正确的言行，什么是錯誤的言行，这是非常必要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正确的言行，什么又是錯誤的言行呢？

二 什么是正确的言行？什么是錯誤的言行？

右派分子說土地改革、抗美援朝、肅清反革命、三反五反、思想改造等五大运动和国家对于資本主义工商业、农业和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都是“糟得很”，“一場糊塗”，

或者說是“整人”，尤其卑鄙無恥居心險惡地把三反、肅反說成是“共產黨屠殺人民”的運動，在他們看來黨所領導的五大運動和三大改造都是根本的錯誤；他們說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是產生三大主義的根源，高等學校的黨委領導制是“三害的溫床”，在他們看來黨的領導和我國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就是根本的錯誤；他們說肅反政策錯了，統購統銷的政策錯了，這也錯了，那也錯了。總起來說，他們認為黨所領導的社會主義革命就是根本的錯誤，黨的領導本身和我們國家的基本政治制度、基本政策就是根本的錯誤。全國人民與他們的看法完全相反，我們認為社會主義首先是無產階級的根本利益，也是全國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國在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勝利以後，可以有三條道路，一條是用和平的方法實現社會主義革命，一條是以強力實現社會主義革命，此外還有一條則是聽任反革命依靠所謂“民主個人主義者”的力量實現復辟。毫無疑問的，我們必須走第一條道路。而為着和平地實現社會主義革命，就必須進行五大運動和三大改造。因為如果不進行五大運動和三大改造，就不能逐步消滅剝削制度，建立社會主義社會。要走社會主義道路，就必須有黨的領導，就必須有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就必須有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因此，在我們看來五大運動和三大改造都是必須的，正確的。肅反政策、統購統銷政策等也都是必須的，正確的。而五大運動和三大改造以及有關的政策又都是由黨領導、制定通過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而取得偉大的勝利的，所以黨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制度也是完全正確的。資產階級右派與我們在看問題上就是這樣的不

同，恰好我們認為是正確的，他們則認為是根本錯誤的。很顯然，錯誤的是他們自身，因為按照社會發展規律，社會主義必然代替資本主義，這是天經地義。由於資產階級右派與我們的矛盾是敵我矛盾，站在敵對的不同方面，看問題當然就會根本不同，這是沒有什麼可以奇怪的。

就是在人民內部，特別是在知識界，曾經對一些政治問題的看法上，也各有其是，各有其非。當然，經過整風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運動之後，人們對一些基本的政治問題，在看法上已經基本上統一起來了。但是，由於資產階級及其影響的存在，剝削階級的思想意識、立場觀點往往在人們的頭腦中還有所反映，知識界中的大多數人還尚待改造成為工人階級的知識分子，同時也由於人們在國家生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人們的生活狀況、社會生活的經驗以及人們的思想狀況不同，因而在日常的政治生活中，也還是有是與非的分歧，而且這種情況的存在將是長期的。

那麼，是非之間，真理與謬誤之間有沒有客觀標準呢？究竟什麼是正確的言行，什麼是錯誤的言行呢？

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指明，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維是第二性的，思維是存在的反映。由此在理論上所達到的必然結論，就是人們頭腦中的概念或觀念能夠如實地反映客觀世界的，即為真理；所謂認識真理，就是認識客觀世界的真相，認識客觀世界的本質和規律。所以，是與非之間，真理與謬誤之間，是擁有嚴格的客觀標準的。人們的思想能夠符合於客觀事物發展的規律性，能夠如實地反映客觀世界，就是具有真理性的認識，否則就是謬誤。

人們以改造环境为目的的一切实际行动，無論是生产的行动，階級斗争的行动，或者其它任何一切的行动，都是受着思想的指导的。因此，如果人們的某种思想符合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的規律性，那么，受这种思想指导的行动就能达到人們預想的目的，就是正确的行动。反之，則不能达到人們預想的目的，是錯誤的行动。毛泽东同志在“論持久战”一書中指出：“一切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实的思想是正确的思想，一切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是正确的行动。”^①譬如苏联在一九五七年十月四日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成功，就是苏联的科学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高度发展的結果，这就表明苏联的科学家如实地反映了（掌握了）有关发射人造卫星的客观規律和制造人造卫星的科学技术。而美国不能在一九五七年发射人造卫星，在一九五八年才能发射人造卫星，而且無論就体积、重量來說都要比苏联早已发射的人造卫星小得多，这就表明美国的科学、技术已經远远地落在苏联的后面，美国的科学家在苏联发射人造卫星的时候，他們还没有完全确切地掌握有关发射人造卫星的客观規律和制造人造卫星的全部科学技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硬要在一九五七年来一个效法苏联的行动——发射人造卫星，企图借以挽回他的什么“优势”，結果自然只能鬧笑话。

言論，譬如写文章、作講演、談話、辯論等等，实际上也是人們参加社会生活的一种行动，是人們行动的一种形式。甚至在一定的意义上說，言論是人們进行其它一切实际行动的一种必不可少的形式。人們如果没有象言論这样的一种行动，人們就不可能很好地交換思想，不可能很好地协同行动。

因此，所謂正确的言行，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講就是根据于正确思想的做或行动；錯誤的言行就是根据于錯誤思想的做或行动。思想的正确或錯誤又在于是否根据和符合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的規律性。所以，言行的正确或謬誤的标准，归根到底，就在于指导某种言行的思想是否符合于客观事物及其发展的規律性。

把这种观点运用于我国当前的政治生活，在政治上我們如何区别正确的言行和錯誤的言行呢？毛泽东同志給我們指出了具体的标准。毛泽东同志說，“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論和行动是完全錯誤的。”他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更进一步具体地指出：“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們的言論和行动的是非呢？我們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主張，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規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設；（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專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專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毛泽东同志还着重指出，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兩条。

为什么毛泽东同志所提出的六条是判断我国政治生活中言行的是非标准呢？

人們經過反右鬥爭和社會主義思想教育之後，都能够從自己的經驗和體會中談出一些正確的道理來，但是，從最根本的意義上說，這六條之所以是判斷言行的是非標準，就是因為這六條概括地指出了在我國當前的政治生活中，人們的言行是否符合於我國的社會發展規律與階級鬥爭規律的全部特徵。

我們知道，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經歷了五種社會形態，這就是原始公社、奴隸社會、封建社會、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代替封建社會的應該是資本主義社會。中國在一八四〇年以前是封建社會，一八四〇年以後，隨着外國資本主義帝國主義的侵入，中國逐漸由封建社會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國家，沒有按照人類社會發展的一般規律由封建社會轉變為資本主義社會。這是因為當中國還處在封建社會的時代，早在十七世紀和十八世紀西歐的許多國家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的階段。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的利益就要求把世界上一切尚未發展到資本主義階段的國家變為其原料產地和商品推銷的市場，變為其奴役剝奪的基地；作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無論在經濟上和政治上都是十分軟弱的，他們不可能也沒有力量擔當起戰勝帝國主義和封建主義的民主革命的任務。在這種客觀條件下，中國就不可能由封建社會發展為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發展成為如同西歐各個資本主義國家一樣的獨立的資本主義共和國，因為這樣的國家就不僅不是被剝奪的基地，而且還是各個資本主義國家爭奪市場的一個對手，這是帝國主義所絕對不容許的。“資產階級的共和國，外國

有过的，中国不能有，因为中国是受帝国主义压迫的国家。”④特别是到了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已经由它在人类历史上具有一定进步作用的东西发展成了它的反对物，成了完全反动的东西的时候，中国社会就更没有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可能了。如果说当资本主义还没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以前，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爬上统治地位或巩固其统治地位，还曾经在一定程度上支持过劳动群众反对资本主义以前的剥削形式，那么，到了帝国主义阶段，当无产阶级和其它劳动群众起来反对资本主义剥削时，资产阶级则立刻与世界上一切最黑暗最反动的势力联合起来镇压劳动人民，反对社会进步，反对革命了。所以从一八四〇年以后，客观上反映了中国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旧民主主义革命，都遭受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横加干涉和破坏，甚至公开出兵镇压中国的革命运动。

虽然中国人民从历次的革命运动中吸取了丰富的经验，积累了对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認識，但是要从中国的社会性质、社会发展规律上認識中国的革命性质及其发展的基本规律，那是到了中国无产阶级已经发展壮大，特别是产生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后，才有可能。一九二二年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第一次科学地分析了中国的政治经济情况，指出了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国家；宣言中规定了党的最高纲领和最低纲领，指出了中国人民的当前的基本任务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立国内和平；推翻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即实现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民族民主革命任务，然后进一步創造条

件，實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此后，党的文献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曾經屢次地闡明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規律。关于整个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和轉变，毛泽东同志指出：“这个革命的第一步、第一阶段，决不是也不能建立中国资产阶级專政的資本主义的社会，而是要建立以中国无产阶级为首領的中国各个革命阶级联合專政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以完結其第一阶段。然后，再使之发展到第二个阶段，以建立中国社会主义的社会。”^⑤“这是两个性質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⑥一九四九年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証明了党对于中国社会性質的分析以及中国革命发展的基本道路的規定是完全正确的。整个中国近代和現代的历史，表明中国并不存在資本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只有經由民主革命实现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历史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中国人民的唯一出路。

今天，当我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已經完成了民主革命和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决定性胜利的时候，资产阶级右派分子企图扭轉中国社会发展的軌道，把中国引到資本主义的歧途，这实际上是要把中国社会拉向后退，退回到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地位，把已經获得了解放的中国人民重新摆布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資本主义的反动統治之下。这种企图和这种企图的言行是違反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規律的，所以是根本錯誤的。同时，因为它企图把历史拉向后退，違反全国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所以它

也是反动的。

当然，有的人是由于認識上的錯誤，暫時的而不是一貫的个别的而不是系統的有違反社会主义道路的言行，这种情况應該作具体分析，不应下“反动”的結論。但是因为它終究是違反客觀規律的，所以仍然是完全錯誤的。所以“一切离开社会主义的言論和行动是完全錯誤的”，所以社会主义道路是判断言行的是非标准之一，而且是很重要的一条。

在中国要取得民主革命的胜利和实现社会主义，就必须由共产党来领导，这也是为中国近代和現代的历史所完全証明了的。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封建主义，这本来是资产階級革命的任务，一般地應該是由资产階級担当领导去完成的，可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中国资产階級担当不了这个任务，不能完成民主革命；从鴉片战争到辛亥革命，無論是旧式的农民战争和资产階級所领导的革命都失敗了，其基本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无产階級及其政党的领导。而一当中国共产党成立，领导了中国革命之后，就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終于取得了民主革命的彻底胜利，为实现社会主义創立了必要的条件。至于說社会主义革命，其它的階級不仅是不能领导，就是連真正的提出社会主义革命的口号也是不可能的。“沒有共产党就沒有新中国”这句话之所以是真理，就是因为它符合于客觀事实，符合于中国革命的客觀規律性。

无产階級要实现其偉大的历史使命——消灭階級消灭剝削建設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除了必須有自己的政党——共产党的领导之外，还必须实行无产階級專政。馬克思下过这